

# 《乱世无自由：浅析魏晋时代与建安七子命运的关系》检测报告



总相似率：23.71%

## 基本信息

文档名称	乱世无自由：浅析魏晋时代与建安七子命运的关系
报告编号	8b563e96-e95f-4e86-a4fb-9b1011de054a
文档字数	7015
提交人姓名	刘傲凡
提交方式	粘贴文本检测
检测范围	学位论文库、硕博论文库、学术期刊库、图书、会议论文库、专利库、报纸、外文文献库、互联网学术资源库、自建比对库
提交时间	2017-12-16 22:27:17

## 检测报告指标详情

原创率	抄袭率	引用率	字数统计	参考文献字数
76.29%	23.36%	0.34%	7015	-

## 相似片段位置图



注：红色部分为论文相似部分，蓝色部分为论文引用部分

## 相似片段详情（仅显示前10条）

序号	篇名	来源	相似率
1	试评建安七子	互联网学术资源库	1.8%
2	捷而能密 文多兼善——刘勰论王粲	互联网学术资源库	1.8%
3	中国的历史上所谓的门阀,士族到底在当时是怎么的一个盛况?是怎样...	互联网学术资源库	1.55%
4	魏晋南北朝隐逸现象及相关问题研究	互联网学术资源库	1.48%
5	晋代是什么意思 《法语助手》法汉_百度知道	互联网学术资源库	1.45%
6	前赤壁赋原文、翻译及赏析_苏轼文言文_古诗文网	互联网学术资源库	1.13%
7	魏晋南北朝隐逸现象及相关问题研究	互联网学术资源库	1.05%
8	王粲研究论文.pdf-毕业论文-文档在线	互联网学术资源库	0.87%
9	论魏晋南北朝困厄文人“虚己以游”的创作特征	互联网学术资源库	0.84%
10	竹林七贤和建安七子分别是谁?_百度知道	互联网学术资源库	0.77%

## 文档原文标注

### 一 引言

三国演义开篇有言——“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魏晋时期的动荡正应验了这句话，魏晋时期的动荡堪称为古今之最。这一时期，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在魏国，自曹丕以后，魏国政治越来越坏。明帝时，后宫人数众多，后宫消耗费几与军费相等。此外，魏明帝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在荥阳附近设方圆千里的大猎场，弊政不断，百姓民不聊生。而在这个时期，适逢出现了一批文人雅士，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这里既有建安七子，以及《世说》中其他的种种奇人异士，他们狂狷恣肆，自有一派风骨，令无数人心驰神往。他们的言行举止可谓“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可他们的本质却并非如此，他们的诗歌具“古意悲凉，遗世弃世”的特点，例如：

### 七哀诗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王粲

看似在描写初离长安在郊外所见难民弃子的惨状，感叹于盛世的难得，实际上体现了诗人对现实的抨击，对权贵，对奸臣的抨击，深刻反映了汉末动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强烈倾吐了诗人对社会现状的哀思。

建安七子的个人性格特点固然与个人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深层次上，体现了大时代的背景格局，忽略魏晋时代变迁之际的现实因素的有影响而单从儒、道交融的因果序列中探寻建安七子的思想，几乎难以实现。因此，我们需结合历史变迁的因素影响，魏晋政权的多端变化，腐化的曹魏集团来看待建安七子及其个人命运。

## 二、魏晋时期、建安七子背景介绍

### （一）魏晋历史背景概述

魏晋时期（220年—420年），指东汉瓦解后，三国到两晋的时期，通常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到公元589年）这段历史的前一阶段。魏晋中“魏”指的是三国北方政权曹魏，而“晋”指的是司马氏建立的晋朝，此时北方正是五胡十六国时期。魏晋时期，国家政权更替频繁，思想自由开放。文化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文学、思想、美术、书法、音乐都诞生了影响后世的大家。人们对人物的品评由道德风范转向人物外貌，进而发展到人物的精神气质，文化史上称之为魏晋风流或魏晋风度。

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深远。当今的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的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观相辅相成。

317年，晋朝宗室司马睿于建康称帝，东晋建立，据有中国南方的领土。中原的世族及平民陆续南迁，形成中国北方侨民和南方土著聚居的局面。东晋初期，王导等人采取镇之以静策略，稳定局势。皇权衰落，朝廷大权主要由世族掌握，由于军权外重内轻，朝廷控制力弱，不少方镇心怀野心，先后发生了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及桓温专政。虽然部分士族当权者有恢复之心，前后发动几次北伐，但是朝廷担心野心家借此扩张势力，大多消极支持。383年，前秦出动举国之师，意图灭亡东晋。面对亡国之祸，东晋君臣一心，凭借淝水决战奠定胜局。谢玄等将领乘胜追击，成功的收复大批失土，致使前秦崩解，引发了北方军事和政治格局的变化。然而，东晋后期又发生朋党相争及桓玄作乱。平民负担沉重，又发生孙恩、卢循之乱。蜀地自立。最后刘裕崛起，平定诸乱，凭借军事力量夺得帝位，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经济方面，东晋庄园经济占据的比例比西晋更大。由于农业技术提升等因素，在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密集开发下，江南获得全面发展而繁荣兴盛，中国的经济中心也逐渐南移，后来才有大运河的出现。此外，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有长足进步。

晋朝虽为汉末以来中国文化中衰之时期，但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等方面也有新的发展。汉代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华夏族，而他族则作为被统治者而同化，汉代以后，政治主权不全在华夏族，而他族或以征服华夏族者而同化，边疆民族带来的草原游牧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时天下大乱，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儒学中衰。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风。玄学与印度东传之佛教交汇，中国文化逐渐转变为儒释道融合之状况。

图一：魏晋南北朝朝代图

## （二）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是汉建安年间（196—220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即曹操、曹丕、曹植）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同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首次将他们相提并论，曹丕在该文中历数当时的文坛名流，特别举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琰、东平刘桢公干”等七人，并评价“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孔融（153年 - 208年9月26日），字文举，东汉末文学家，鲁国曲阜人，建安七子之一，孔子二十代孙，高祖父孔尚，钜鹿太守。父孔宙，太山都尉。由于曾任北海相，亦称孔北海，后因得罪相国曹操，遭处死并株连一家。

陈琳（2世纪 - 217年），字孔璋，广陵射阳[1]（今江苏扬州东北）人。东汉时期文学家。著名著作《为袁绍檄豫州文》

王粲（177年—217年2月17日），字仲宣。山阳郡高平县（今山东微山两城镇）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太尉王龚曾孙、司空王畅之孙。

徐干（171年 - 218年），字伟长，三国时期文学家，北海郡剧县人建安初年，曹操召授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又转五官中郎将文学。建安中，因病辞职，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后又授以上艾长，但也因病谢绝。

阮瑀（2世纪 - 212年），字元瑜。陈留尉氏（今属河南开封市）人，东汉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阮籍位列“竹林七贤”之一，孙阮咸亦是当时名士。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

为“奇才”。曹操征之为官，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非但章、表、书、记出色，诗歌亦有文名，语言朴素，往往能反映出民众底层的社会问题。诗有《驾出北郭门行》

应场（2世纪 - 217年），字德璉，东汉汝南南顿（今河南省项城县）人，建安七子之一。伯父应劭，父应珣。应场出生于书香世家，长于辞赋，曾被曹操聘为掾属，后为五官中郎将文学。诗作流传不多，有文赋数十篇，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

刘桢（2世纪 - 217年），字公干，东平郡宁阳县（今属山东）人。建安年间，刘桢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与曹丕兄弟颇有往来。后刘桢因在席上“平视”曹丕妻子甄氏，曹操以不敬之罪劳役，后又免罪署为小吏。诗作传世不多，今存诗十五首，《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与陈琳、徐干、应场同染疾亡。传世有《刘公干集》。

### 三、浅析魏晋时代与建安七子个人命运的关系

#### （一）魏晋士族、门阀政治对庶民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的隐士数量之多堪称世界之最，隐逸现象和隐士的生活也因其“隐”而变得神秘莫测，而魏晋时期的官僚由士族之中产生，士族发展之至为门阀。

所谓士族，是经学传家之族，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就是知识分子家庭。武帝之后独尊儒术，而且官员皆由察举而出，要被察举进入仕途，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通晓儒家经典。但当时没有印刷术，没有造纸术，学术被垄断在少数人手中。这些拥有学术、知识、书籍的家族，将学术和书籍代代相传，形成“累世经学”之家，而这些家族的成员由于拥有学术知识，天然就具备出仕资格。此外，由于察举制度，士人要出仕，必须经过太守举荐，太守在举荐过程中多首推自己的门生故吏，此外还有种种权门请托。如此一来，“累世经学”变成“累世公卿”（如汝南袁氏，五世公卿）。

知识的垄断带来了门阀士族的勃兴。待到曹魏建国，司马氏立晋，九品中正制日趋发展成熟，逐渐使“品”与“家世”紧密相连，以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经历汉末动乱，在魏晋享有统治权力的士族已成为集政治特权（九品中正制带来的士家福利），经济特权（庄园主，享有荫客、占田、免役特权）和文化主导者（家传之学，彼时已开始向玄学发展）于一体的社会精英群体，门阀制度已呈尾大之势。

因此没有机会或没有条件出仕的士人长期或暂时性远离社会政治活动，游走于社会边缘的行为。隐逸现象是魏晋南北朝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隐逸思想广泛流行、隐士群体力量十分壮大，涵盖了士人中的各个阶层，而且在魏晋得到扩有史以来最为广泛的社会认同。这大概也是庶民阶级的一种联合，更是一种应对门阀政治的方式吧。

此外，另一个原因还起了相当一部分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的出现，追溯其渊源是东汉以来豪族地主田庄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田庄，役使失地农民和贫苦族人从事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并以宗族、宾客、徒附、部曲、奴婢等不同等级。部分有识之士不满于这种为士族、门阀一辈子的辛劳的局面，选择归隐，闲适安逸。基本的生活保障是隐士能够持续隐居生活、坚守人格自由和独立的前提。所以，小农经济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对隐逸现象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摆脱了经济压迫的魏晋南北朝隐士普遍长寿，因为他们的社会压力相对较小，生活方式较为健康，这促进了一部分本就在避世与出世观念之间徘徊的人才隐逸。

更甚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读书人与庶族读书人的区别是社会地位不同，士族与庶族之间不通婚姻，甚至不相来往。二是士族享有经济特权，可以广占田园、垄断山泽，免除赋役。三是士族在受到刑罚的时候，与庶族读书人相比有特权。如南齐“永明中，敕亲近不得辄有申荐，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四是士族依靠其家族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教养，垄断某些清要的官职。当时的所谓“清官”，就是职闲虞重、地望清美、升迁极快的官位，庶族不能染指。



庶族寒门社会地位低下，但不一定都贫穷，也可能经济上很富有而社会地位仍属寒庶。如“南朝时临海郡（今浙江临海市）富豪刘玉真“资财巨万”，但他仍属寒庶，所以当他试图以巨万之资作为陪嫁，将女儿嫁给士族后裔王元规，以攀高门，遭到坚决拒绝”。可见士族与庶族这种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等级区分，更带有身份性的压迫

综上所述，魏晋士族、门阀政治造成了政治排外，经济难以独立，身份压迫多种形式对庶族的压迫，间接的更是人才大量流失，许多有志之士不得已归隐。魏晋时期的名仕处于两种极端状态，其一庶族名仕大部分完全远离朝廷，淡泊名利，或因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与统治阶级发生矛盾而英年早逝，含恨而死。二是士族与统治阶级在利益上具有一致性，受到了很好的文化熏陶，树立了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

## （二）文化名人受统治集团的影响

在汉末三国的舞台上，司马家族孤注一掷，全部出仕于曹魏，并成为了三国最终的胜利者。由于司马懿的名气太大，司马家族其他人物的形象似乎只是作为他的附庸和延续，但事实上他们各有各的人格，也各有各的选择。

东汉时期，普通人要做官呢，都是要通过察举、征辟出仕的。所以很多大官僚就跟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集团，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到了东汉末年就形成了一些累世工卿的家族，袁绍家族就是其中的典型，四世三公，所以他能当初讨伐董卓联军的盟主都是靠他祖辈的荫泽，门生故吏便天下所致。

当时的名士都出身于这个阶层，曹魏背后是颍川的门阀大族支持，东吴则是江东的豪族支持。由于曹操出身于宦官之家，所以不被名士所尊重。所以曹操在《短歌行》中发出了“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的感叹，渴望人才。而司马集团更因叛逆篡位而夺取到了政权，为当时从小便接受“天地君亲师”的儒家教育的社会名人普遍不所厌恶，但是这些名人在社会上又存在一定的影响力。这便为文化名人与统治集团之间埋下了一个深重的矛盾。

建安七子中的孔融便体现了这个矛盾。孔融性格豪放不羁，经常做出一些蔑视礼教、离经叛道的事。他内心对大汉王朝非常忠诚，对曹操的专横跋扈非常反感。曹操攻下邳城，曹丕将袁熙的妻子甄氏抢来做了自己的妻子。孔融知道这件事后，专门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说当年周武王伐纣的时候肯定将妲己抢来赐给了自己的儿子周公。曹操没有反应过来，还以为孔融说的是一个什么典故，询问孔融。孔融回答说：“拿今天的事情看来，当初也应该是这样的！”把曹操气得半死。那时粮食供应紧张，为了节省粮食，曹操下了禁酒令，不让喝酒。孔融最爱喝酒，便又给曹操写了一封信，大谈酒的好处，公然与曹操顶牛，曹操对孔融更加气愤。曹操害怕孔融的言论会危及自己的统治，便决定置孔融于死地。他暗中指使路粹上书弹劾孔融，说孔融“招合徒众，欲规不轨”，“大逆不道，宜极重诛”。

而对于孔融一家的遭遇，我们可以从这段话中了解到，“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世说新语·言语》。追溯其根本原因，还是文化名人与统治集团在思想与精神层面存在分歧的缘故。

以孔融为代表的读书人在意识到经学章句的陈腐和虚伪，并走出封闭的书斋，对宇宙和人生进行冷峻的思索，选择自己生活的道路，重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更因抒发自己对时事的看法，与统治者不同而受到迫害。

而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王粲前后的变化。

王粲出生时，大汉王朝已危如累卵。东汉初平元年(190年)，王粲14岁时，东京暴乱，董卓焚烧洛阳官室，挟持汉献帝和朝中官吏迁往西京长安。这一年，王粲随父亲从洛阳流徙长安，两年后，长安大乱，他被迫再度流徙，投奔荆州刘表。战乱之中的王粲亲身经历了背井离乡，四处漂泊，他急切渴望安定的生活和太平盛世，有强烈的参政意识。总结起来，他在荆州帮助刘表做了几件

大事：

其一，他为巩固荆州的军事活动大造舆论。

其二，帮助刘表极力周旋袁绍同盟内的矛盾。刘表结盟袁绍，目的在于牵制曹操，倘使袁绍势力被彻底消灭，这自然会危及荆州的安全。

故此，王粲受命以刘表名义分别发出《为刘荆州谏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二书均晓之以礼，动以亲情，劝二袁“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后，乃议兄弟之怨，使记注之士，定曲直之评，不亦上策邪！”王粲展现出“疾呼泣血”的情感，展示出“苏张复生”的才力，以期使袁尚、袁谭携手共奖汉室。王粲在政治舞台上能积极用世是与王氏家族之学密不可分的，而“王氏家族之学乃是以五经为本，受到了汉代经学天人相通，经世致用的精神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前期的王粲与时进取，希冀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在《登楼赋》中王粲抒发了“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的壮怀，由于在刘表手下的不受重视，到归附曹操后被封侯授职，王粲感到心情舒畅，深受鼓舞。追随曹操，在王粲看来正好可以乘时进取，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在依附曹操的近十年中，他基本上是踌躇满志的。在与曹植等人同作的奉和七体文《七释》中，王粲“致辨于事理”，主张圣王之世，有志之士应当献身于政治，建功立业，“形中情于姐豆，宣德教于四邦”。在奉和曹王的舫连黼黻中，王粲力劝明主要任贤纳言，“帝王虽贤，非良臣无以济天下”，“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饱含着王粲关心国家大事的一片赤诚之心和效命时世的真诚。后来王粲追随曹操南征孙权、西征马超、张鲁，写下军旅诗《从军(行)》。赞颂曹操武略。王粲依附曹操后曾奉祝曹曰：“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应当说王粲的这番话不仅仅是出于应酬，而是表达了他初仕曹操的认识以及甘愿效命曹氏的心情。

王粲博闻强记、明习前朝礼乐制度的特长引起了曹操的重视，被任命为侍中，和卫凯共同制定魏国朝仪，一起草创了典章制度，《三国志·魏志·王粲传》中记载“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王粲此时可谓春风得意，达到了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

以王粲为首的士族士人在家世、时事的影响下走向了建功扬名之路，如王粲在《咏史诗》中曾高喊要“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在《从军诗》其二中有言“弃余亲睦恩，输力竭忠贞”。

#### 四、结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期，也是一个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情的一个时代。魏晋人实现理想人格的过程是艰难复杂的。有的守死不二，有的淡泊名利、隐居躬耕，也有的逐渐散失理想人格与现实妥协，形成一种复杂的人格。

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魏晋困厄文人走向了两个极端——

孔融等士人努力以“诗学正义”抗议社会不义，念兹在兹地追求自由。他们努力摆脱客观现实，又褪去主体、身体之束缚，表现为放浪形骸，不拘礼节，蔑视凡尘，狂傲纵情，达到绝对意义上的精神自由。

王粲等士人走向了积极出世的方向，“恨圣时之不遇，哀民生之多艰，愿与国共忧患”。的兼济天下的胸怀，他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用法治与儒术并重的策略，实现国家的安定与繁荣。